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谨以此书
献给我永远怀念的爸爸妈妈

中国工人的命运

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

冯同庆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社会科学文库
研究系列

中国工人的命运

——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

冯同庆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工人的命运——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冯同庆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ISBN 7-80149-636-1

I. 中… II. 冯… III. 工人阶级-现状-研究-中国
IV. D6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4850号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中国工人的命运

——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



著 者：冯同庆
责任编辑：张大伟
责任校对：闫晓琦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8.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36-1/D·100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冯同庆，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工运学院教授、副院长，长期从事职工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与关系》等书和文章。

现代社会学文库

部分书目

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

——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

冯同庆 著

消费社会学

王宁 著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李沛良 著

内部分化与流动

——一家国有企业的二十年

游正林 著

宗教社会学

戴康生等 主编

仪式与社会变迁

郭于华 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

许欣欣 著

3A 工作室
DESIGN STUDIO

封面设计 / 高宏建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内部关系研究”的成果之一

谨以此书

献给我永远怀念着的爸爸和妈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工人地位的变迁与其自身社会行动	1
一、对中国工人地位进行研究的已有文献	1
二、一种格外令我属意的研究理论——工人作为社会 行动者	5
三、本书运用的具体方法	12
四、本书的内容	19
五、本书的结构	20
第二章 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在自尊中失落	24
一、最初的失落	24
二、失落中的希冀	29
三、希冀中的自尊	31
四、自尊导致失落吗	65

第三章 社会行动的意料后果——在自信中改观	103
一、最初的改观	103
二、改观中的隐忧	107
三、隐忧中的自信	108
四、自信导致改观吗	116
第四章 团体社会行动的后果——关注利益更注重功能 ..	126
一、相关问题的讨论	126
二、中国工会有了更多的利益代表性	137
三、中国工会更是社会功能组织——工人个体 行动的视角	145
四、中国工会更是社会功能组织——团体行动的视角 ..	153
第五章 社会行动的未来后果	
——在经济民主中寻求定位和谋求发展	164
一、寻求经济民主是工人社会行动的重要特征	164
二、民间的经济民主在扩展	185
三、经济民主制度会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214
主要参考书目	249
后 记	257

第一章

中国工人地位的变迁与 其自身社会行动

一、对中国工人地位进行研究的已有文献

1. 20世纪80、90年代的一般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中国工运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正是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企业改革逐步深化。笔者开始用以往学习过的经济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研究工人的地位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学的统计调查方法引起人们的关注，总工会也准备开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笔者又开始学习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1991年，笔者和同事们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展了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的调查研究项目。^[1]这是中国在这个专题上组织的首次调查研究。笔者重点研究的是处在现

阶段社会转变时期的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的关系，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分析方法和社会学统计方法。在工人与管理人员、工人与技术人员的相互关系中，重点考察了工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阶层意识等指标。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工人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之间的阶层分化将呈现有力度而温和的特征。

在这之后，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变时期工人地位的变迁，就成为笔者特别关注和一直跟踪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实际上，在我们做工人地位课题研究之前，已经有一些综合性调查涉及到了这个内容。这些调查是：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关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198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中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等。^[2]这些调查提供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访谈资料，但就研究方法而言，与学术研究有所不同。侧重的是现实政策的分析，注重结论对实际工作的直接指导意义，使用的语言也讲究一定的宣传性。在这些调查之外，还有两项学术性调查。一项是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调查”^[3]。这是从社会心理角度开展的研究，在被调查样本人数中普通工人为67.4%。另一项是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职工问题调查”。^[4]这是从管理学角度对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职工心态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工人的相关情况。

在我们进行了1991年的调查之后，涉及工人地位的学术性调查和研究逐渐多了起来。1992年香港和广州的学者整理介绍了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一般方法，并在广东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其中有些涉及到了工人地位。^[5]1993年，中国人民

大学的李强教授出版了其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社会学专著，其中对工人的年龄结构、所有制结构、与管理人員的矛盾进行了分析。^[6]1994年，南开大学的朱光磊教授等人出版了其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学专著，其中对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政治状况、社会心态及社会行为进行了论述。^[7]1994、1995年，一些对私营企业雇工进行调查的成果公开发表。这些成果大多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雇工的分布、文化素质、流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进行了研究。^[8]1995年，中国工运学院的常凯教授等人出版了研究当代中国劳动问题的专著，对劳动者、劳工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重点研究其社会地位和劳动权利。^[9]1997、1998年，出现了一些对社会各阶层，包括工人阶层进行现象描述的著述。^[10]

用现在的眼光审视上述调查和研究有着共同的特点。借用香港理工大学一位学者的话，便是侧重勾划社会资源分配的面貌，以及分辨出社会结构里占用资源的各社会阶层类别。^[11]这种方法的研究，当然有其独立的意义。对于了解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变时期资源分配状况的变化，及其对工人地位的影响，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其实，还有另外的方法。例如，按那位香港学者的话说，可以是建基于对社会阶层的描绘，藉此来衡量不同阶层的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12]这在研究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变时期工人地位时运用得是不够的。近年来，笔者时常考虑，怎么样能学会运用后一种方法呢？

2. 有特殊意义的几项研究

有几项涉及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变时期工人地位的研究，使笔者深受触动。

一项是华尔德（Andrew G. Walder）研究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工业劳动关系的成果。他关注的不是对社会各阶层特征的描述，而是在这种描述基础上对不同阶层及其相互间人的行为和关系的研究。华尔德认为，工人与企业之间有一种上下互惠的关系，并由一些独特的原则和亚文化加以维系。^[13]其结果，正如他的学生龚小夏所说，他研究的是我非常熟悉并且在其中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工厂制度，而作者提示了许多我已经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的制度与结构层面的意义，提示了全新的观察角度，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传统”的事物实际上全然是现代体制的产物。^[14]笔者也深有同感。

另一项是唐文方（Wenfang Tang）研究中国 80 年代中和 90 年代初企业工人参与决策的成果。他认为，人们提出和研究各种各样企业参与的方案，但很少有人考虑工人为什么要参与。唐文方认为，不是工人的总收益，而是他的收益与花费在参与上的支出（诸如花费在参加会议上的时间和精力与获取作决策时所需的专门知识）的比率的增加，决定着工人的参与欲望。^[15]他还认为，从工人的观点看来，不论是自发的还是被动员的，参与只不过意味着获得自身利益，不完全是靠政治强迫，而且还是靠物质鼓励来维持的。^[16]至于工人参与的未来，他认为取决于工人是否愿意放弃他们的安全感和生活保障而换取市场条件下的自由与风险。^[17]笔者认为，这较为符合中国企业的实际。

再一项是美国学者 Jeanne L. Wilson 和澳大利亚学者 Anita Chan，对处在变革中的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工会）进行的研究。在他们看来，目前统一的中国工会对改革的适应能力，比一般人想象得会更大。笔者感到，他们的研究对相关问题的说明相

当中肯。

总之，这三项研究运用的方法，让笔者感到鲜活，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真正促使笔者自己运用类似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变时期工人的地位，则是阅读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著作《社会的构成》之后。

二、一种格外令我属意的研究理论 ——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

1. 吉登斯关于社会行动者的论说

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社会的构成》，是研讨社会结构理论的宏篇巨帙。吸引笔者且令本人激动不已的，是他关于社会行动者的论说。

在吉登斯看来，理解社会，特别是理解现代社会生活与此前的社会生活的“非连贯性”或“非连续性”，“关键是要避免这样一种假设，即想当然地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一个‘社会’究竟是什么”。^[18]之所以要避免这样一种假设，是因为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往往忽略社会行动者在社会演进，特别是社会转变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行动者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的条件和后果都拥有大量的知识”。^[19]他认为，社会科学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认知能力、行动后果等之间，存在着交互解释的作用，即“双重解释”。他说：“我们无法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结论与它们所探讨的意义及行动世界截然分开；另一方面，普通行动者（Lay actors）也是社会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参与构成了作为职业

社会观察者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的活动和制度。在普通行动者与专家分别作出的有根据的社会学思考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诚然，笔者并不想否认这两者之间，确实有所区别，只是说它们不可能泾渭分明。无论是创新的理论，还是经验的调查，社会科学家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主题，都没有绝对的垄断权。”^[20]他希望对社会的研究和理解，要关注社会活动中这些更为凡俗，更为实际的方面。

当然，关于社会行动者的论述并不是吉登斯的专利。现代社会学中有三种基本的研究观点，即功能主义的、冲突的和相互作用的观点。其中，相互作用的观点，大力强调从在社会上行动着的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要关心在人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社会相互作用。相互作用论的发展受到社会心理学和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的巨大影响。^[21]在当代社会学中，吉登斯受到了舒茨（Alfred Schutz）、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等人的重要影响。例如，舒茨有关社会行动的特点在于它对未来筹划的学说，对吉登斯的“自我调控”、“生平筹划”等社会行动思想产生了影响。^[22]又如，吉登斯曾系统地研究加芬克尔等人的常人方法学的理论，并大量吸收其概念和研究思路以发展自己的理论。^[23]诚然，吉登斯也并非简单地因袭前人，他对相关的社会学经典思想的系统整理和对现当代诸多思潮的广泛吸收及批判，是其他同代学者无法企及的。^[24]可能是因为如此，笔者对吉登斯有关社会行动者的论说，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信赖。

2. 来自田野的支持

在目前中国社会转变时期逐渐形成的一个崇尚“精英”的氛

围里，读着吉登斯关于“普通行动者也是社会理论家”、社会科学家“都没有绝对的垄断”……这样的论说，不由地把笔者的思绪拉回到30年前。

那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作为知识青年到内蒙古农村插队。对于笔者来说，这是第一次走进田野，走进社会。

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究竟能在农村呆多久？这是当时经常被议论的问题。按着伟大领袖的教导，有人认为应该呆一辈子。当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干革命，青春献给土默川（笔者插队所在地）”。对此，多数知识青年，起码就笔者个人而言，笃信不疑。“没有知识”的农民，则对这些口号付之一笑。他们说，没有的事，三、五年之后你们就都回城了。问其缘由，回答是：“你们有知识，国家需要你们，怎么能一辈子与土圪塔打交道呢？另外，毛主席是让你们锻炼锻炼，锻炼好了，就要走了，他老人家也心痛你们呀！”后来，绝大多数知青们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城了，笔者是在插队后的第五年离开了那里。在这之后，笔者曾多次回味那些与农民之间的争辩。笔者常常感到吃惊，“没有知识”的老农竟比有知识的青年料事料得准。笔者也常常感到惭愧，知识学到哪儿去了？你不能不服这些农民——用吉登斯的话讲，叫“普通的社会行动者”。

还有让笔者感触更深的。我们当时已是高中毕业生，在农民中也确是受教育更多的一群人。由于识文断字，我们给当地引进了良种栽培、圈养牲畜、机械打井、瓜菜种植、林木栽培、有线广播、民办学校等等。我们的企盼是，让当地农村富裕起来。然而无奈的是，农民们依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好吃懒做”。

在一望无垠的肥沃的土默川平原上，生活着的则是赤贫如洗的人们。问其缘由，回答是：“土地‘归大堆’，干好干坏一个样，为什么好好干？好好干吃亏，不好好干反而占便宜，谁还好好干？”再问：“都不好好干，那就得受穷了？”回答是：“受穷就受穷，又不是就我一个穷。”当时的笔者，真是感到困惑。以至于笔者离开那里的时候，依然没有搞懂——怎么会这样？应该怎么样？后来，笔者又有机会回去过那里两次。由于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劳动成果与个人的努力直接挂钩，这些老乡们焕发出生产积极性，粮食打得多了，副业也有了发展，生活日渐富裕。走到笔者曾经流过汗水的土地里，看到自己亲自组织挖掘的几眼机井废弃了（集体财产因家庭经营而无人顾及了），看到自己亲自组织栽种的林木已一派凋零（集体财产因家庭经营而无人监护了）……真让人感慨万千。然而，看到乡亲们招待我们的丰盛的饭菜，看到他们居住条件的改善……那是以往未曾有过的，也让人感到宽慰。这就是吉登斯眼中的“普通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干的往往是不符合条文却符合常识的事，而农村的社会转变恰恰是从回归常识开始的。而我们当时所具有的知识，却往往有的不符合常识。

《社会的构成》便这样启发着笔者：学问也是可以这样做的。

3. 不同学科的共同诉求

可能是受到《社会的构成》的启发，后来笔者留意到其他学科也有相关的信息。

先是一位记者与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访谈录。

笔者曾在钟先生任教的大学里学习和工作过多年，常常看